

文学史的当代讲述

—— 钱基博和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凤凰出版社

文学史的当代讲述

——
钱基博和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学史的当代讲述 : 钱基博和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 姜晓云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506-2315-6

I. ①文… II. ①姜…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9457号

书 名	文学史的当代讲述——钱基博和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著 者	姜晓云
责 任 编 辑	李相东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211523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42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315-6
定 价	4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25-57572508)



序

骆冬青

大约是 1975 年，我念小学四年级，一次忽神经搭错，用繁体字写了一篇作文。老师告到家长，于是，屁股受到了巴掌严厉的批判。自肉体传递到心灵，从此知道“反动”的代价。大约是 1980 年，读到一部奇书，全书乃读书笔记，文言写就，却夹杂许多洋文，现在看来，似是“后现代”，却又“前现代”。那种怪诞荒莽，那种冷冷的幽默，那种可怕的炫耀似的博学，都令我心折。可是，莫名地，“反动”二字不期然地冒上心头，屁股上的痛带着痒酥酥的快感，无情袭来。这个著书的钱锺书，经过了那么多的劫难，却还像花岗岩一样，用自己坚硬的脑袋撞击着无所不在的无物之阵，真够胆大的。

钱锺书现在早已成为显学，《管锥编》已经多次增补、印刷。现在，文化保守主义也有了颇为宽广的空间，学术上的“平反”似乎没有多少紧迫性了。可是，如果不放在反现代、反潮流，乃至“反革命”的背景下，我们就无法认清钱锺书们的价值。而这却往往是被钱锺书、陈寅恪他们的博学或纯学术所遮掩的。从王



国维到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似乎都表现在不为潮流所转移的“反动”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流击水，主动投身其中，固然造就无数英雄，可是，逆流而上的“反动”，“浪遏飞舟”，不也呈现了另一种激越和崇高？“反者道之动”，“道”，在经历潮流的冲洗后，静静地呈现着磐石般的坚韧不拔。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是否在学术的血缘上，也是钱锺书的“父亲”？能否从钱锺书“反观”钱基博？据说，钱锺书小时候也曾挨过老子的肉体批判，老子的顽固是否传递给了曾留洋的小先生？那么，从钱锺书到钱基博，这种“逆向的学术史”是否也有其价值？……在我看来，钱基博固然不必借重于钱锺书，可是，钱基博在当代学术中引起重视，却不可否认有钱锺书因素。因此，钱锺书与钱基博的学术关联，不能不引起重视。

钱锺书自谓狷者，自述为学曰：“独行其是，不顾人非，自娱其老，不期同好。立宗开派，觉世牖民，既无此心，亦无此力耳。”狷者，有所不为也。保持价值判断的独立自由，方可不为流俗所动，独行其是。正是这种对所“是”的信念，在早年的《谈艺录》，晚年的《管锥编》中，以一种不趋时、不趋势的“自说自话”的姿态，表现了一名学者的铮铮风骨。这与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化永恒性的守望，精神上内在相通。“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一肚皮不合时宜”，“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一脉相承的独立、自由，或许，正是从钱基博到钱锺书学术中显现的重要



性格。所以，在举世滔滔的“新文学”运动中，钱基博对抗“线性进化论”而作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沉沦于时势久矣，却在无数风浪之后，悄悄地从浪潮中“水落石出”，默默地显示了一种别样的存在。

钱基博所谓“现代中国”，不取通常“五四”以来的叙事，而与“没有晚晴，何来五四”的理念相通，即将“清末民初”作为整体，恢复了历史的延续性。这就着眼于“通变”，着眼于流脉的贯通，而否定了激进的“断流”。这在学术上，无疑，更具其内在的合理性。因为，中国四千年的文学传统，在“现代中国”代表作家身上，还具有深刻的表现。“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思潮，是标举“新文学”的，甚至为了标举“现代”，故意给“古文学”戴上一顶“旧文学”的帽子。在这些“线性进化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古文学”被直接否定掉了，以至“无葬身之地”。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以“现代”命名，内容却并非那种笼罩着“现代”意识“文学史”，而是包括“古文学”和“新文学”两大部分，其中，“古文学”包括文（魏晋文、骈文、散文）、诗（中晚唐诗、宋诗）、词、曲，“新文学”包括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相对而言，“古文学”占了很大比重，符合中国从古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清末民初“三十年”文坛现状。之所以这么做，更体现了钱基博先生所秉持的“博古通今，藏往知来”的文学史观。观念不同，所叙述的作家自然不同。在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业已匿迹的许多作家，或者被作为反面典型的作家，在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



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王闿运、章炳麟、苏玄瑛、刘师培、李详、孙德谦、黄孝纾、王树枏、贺涛、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林纾、樊增祥、易顺鼎、杨圻、陈三立、陈衍、郑孝胥、胡朝梁、李宣龚、朱祖谋、况周颐、王国维、吴梅……这些当今学习“现代文学史”的学生颇有陌生感到甚至可嗅到一种浓烈腐败气息的名字，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主角，不能不说，有一种看来颇为可怕的执着，灌注在其中。与此相应，钱基博把《现代中国文学史》比喻成“孽镜台”，对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中国现代文学家走上“灭裂传统”的歧路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但在讲述态度上，钱基博先生则始终恪守“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的独立精神和客观态度。

正因如此，这部文学史著作所具的鲜明性格，戛戛独造，值得我们从容审视。姜晓云兄的这部著作，对钱基博的这部《现代中国文学史》从学术上细致探索，真正站在历史的高度，勘定其文学史写作的独特性，揭示钱基博先生的重要价值之所在，具有深刻的意义。

晓云认为，钱基博引入西方新兴的“国家文学史”这一研究范式，通过“现代中国文学史”讲述这些现代作家，目的在于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整个中国国家文学进行一种新式的历史批评，以厘清当代文学中的一些历史乱象。清末民初作为中国的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保留着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轨迹，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殊性和高度的典型性，逐渐成为当前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领域。这段历史时期的现代学人，由于同时具备旧



学和新知，并且有着极其复杂的心路历程，更是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前沿。钱基博著作的“前瞻性”，正是在看似“保守”的文化心态中呈现出来。

钱著的文学史叙事，晓云的博士导师刘梦溪先生归结为“按文体分类叙述，各文体下面分论作家”，认为如此行文，“非大家不敢这样做”，并称这种写作体例，是“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大特色”。“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为目”，要求对古今文体有深入的把握，对现代作家有充分的认识。这种写作体例，结构也比较松散，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融合清末民初思想做派各异的“现代作家”。晓云认为，钱著对中国文学史的当代讲述，虽然讲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国家文学”，但面对的毕竟是大学的青年学生，而且是“当堂讲述”，只有讲得生动有趣，才能让他们“发生兴趣”。为此，钱基博先生所进行的这种新式的历史批评，是依托于传统史书中的纪传体方式的，晓云称之为“纪传批评”。这种纪传批评，讲究“裁篇同传”，讲究“知人论世”，其中既有故事、作品，还有“义”、有“品”，有“归趣”、有“咏叹”，使得讲述本身充满着历史观感，有着不可比拟的客观性、整体性和深刻性，自然能够引人入胜。因此，纪传批评是一种整体性批评，是钱基博对“现代文学家”的“别为创制”。

在刘梦溪先生指导下，晓云博士对钱基博先生《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读，有许多颇为精细的发现，值得我们深思。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现实考量，清末民初时期还有许多宝藏长期隐灭于研究者视野之外。盼望晓云博士继续“深耕”下去，当有更多的



文学和思想文化上的发现，对当今的文学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有更多的启示。

钱基博字钱锺书曰“默存”，或取意于《易经·系辞》的“默而成知，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在我看来，这种默默而存的精神，正是钱氏夫子那种独立不依、不事声张，一种倔强、坚硬而智慧的精神显现。晓云既注目于此，当以此精神进入更为深广的文化学术领域，成为一块八风不动的磐石。

2015年6月28日



前言

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大学课堂教学的产物。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一所教会大学，学生中普遍存在重英文教学而轻国文教学的现象。1923年，该校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系务会决定，由钱基博先生“开文学史一课”。钱基博先生在首堂课的开场白中对学生讲道：“我不想讲古代文学，惹诸位的厌；我想讲近三十年文学演变以到胡适，其人皆现在；而姓名，皆诸位在报上看到，必能发生兴趣；然而旧演变，形形色色；中国四千年文学之演变，亦可缩影到此二三十人身上，作一反映！”1932年，作为大学课堂讲稿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由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学生集资刊印。《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一部由当代人讲述的当代中国文学史，也是第一部以“现代”名义命名的“中国文学史”，还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用文言文写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可谓是一本奇书。该书集中体现了“文学史的当代讲述”这一视角，仅此而言，就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意义。

钱基博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当代讲述，虽然面对的是大学的学生，讲述的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国家文学”。1894



年甲午战争，清朝继此前轮番输给西方列强之后，竟完败于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小国日本，可谓举国震惊；1897年，严复翻译出版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继中世纪佛学思想后大规模进入中国；1898年的“百日维新”及“戊戌政变”、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5年的袁世凯称帝及其后的军阀混战，中国的政局险象环生；1905年的废科举、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的文化思想也愈来愈新进。文学作为政治、军事、思想和社会人心的“投影”和“反光”，需要从“国家”的角度，做一个系统的梳理。1917年，钱基博先生动念写作《现代中国文学史》，讲述的目光远在教学之外。

钱基博先生讲述“现代中国文学史”，有一个极其宏大的目标，那就是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型之际，本着“博古通今，藏往知来”的史观，依据中国及其自身深厚的文化积淀，引入西方新兴的“国家文学史”这一研究范式，对整个中国国家文学展开历史叙事，以厘清当代文学中的一些历史乱象。为此，他甚至把《现代中国文学史》比喻成“孽镜台”。书中对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中国现代文学家走上“灭裂传统”的歧路以及“论喜惊众”的复杂心态所进行的检讨，与“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大异其趣。钱基博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当代讲述，既是对作家作品、流派现象、文学思潮、政制风俗进行回忆、反思、评判、记录的过程，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自省的过程。

《现代中国文学史》虽然是当代人讲述当代文学史，“其人皆



现在”，讲述者与被讲述者之间存在着十分“亲密”的关系，但在讲述态度上，钱基博先生坚守“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的学术独立立场，本着“词融今古，理通欧亚”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理路，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讲述与中国文学史连接起来，通过阐发“中国四千年文学之演变”，观近代以来“文章得失升降之故”，对作家作品的品评自有见地。在讲述方式上，钱基博先生“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为目”，提倡并采用“纪实传信”的历史批评方式，“裁篇同传”的纪传批评方式，“著其异议”的比较批评方式，使得讲述本身既具有历史观感，又能做到“知人论世”，有着不可比拟的客观性、整体性和深刻性。

钱基博先生以“博古”来“通今”的讲述立场，有助于通中国古今文学之“不变”，不易于通中国古今文学之“变”，因而具有一定的保守色彩，对新兴的白话文（含诗歌、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历史认识也不够。可见，钱基博先生讲述《现代中国文学史》，其目的并非为所谓的“现代中国文学”张目，而在于对“四千年中国文学”的坚守，从而在中国社会的巨大转折点之上，塑造起一个富有文化意味的、坚定的、独特的讲述者形象！



目 录

序	骆冬青 001
前言	001
第一章 绪论	001
第一节 清末民初时期对“旧文化”的检讨	001
第二节 “中国文学史”研究新范式的引入	007
第三节 当前为何要重提《现代中国文学史》	012
第四节 本书的基本内容与逻辑结构	016
第二章 “博古通今”的讲述姿态	020
第一节 “执古”与“骛外”思潮	020
第二节 “观其会通”的文学史观	025
第三节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体例	032
第三章 对现代文人的批评态度	046
第一节 “论喜惊众”的现代文人	047
第二节 “灭裂传统”的历史歧路	052
第三节 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	058



第四章 “不立宗派”的独立精神	065
第一节 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	065
第二节 追求“理势之必然”	071
第三节 显示“一家之言”	073
第五章 “纪实传信”的历史批评方式	079
第一节 “纪实传信”：历史批评的落脚点	080
第二节 “洞源索流”：历史批评的目的	085
第三节 “事、义、文”：历史批评三要素	089
第六章 “知人论世”的纪传批评方式	095
第一节 “别为创制”的纪传批评	096
第二节 纪传批评的基本范畴	100
第三节 纪传批评态度：“知人论世”	106
第七章 “著其异议”的比较批评方式	113
第一节 “求真理之发见”的比较批评	114
第二节 “著其异议”的“列异”之法	118
第三节 “穷其流变”的“考异”之法	122
第八章 “词融今古，理通欧亚”的文学整体观	127
第一节 从“抒情”到“发智”	128
第二节 从“文言”到“白话”	133
第三节 用文言文写作《现代中国文学史》	139
第九章 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集旧与开先	147
第一节 集旧与开先	147
第二节 一个追赶的年代	152



第三节 学古以为新	156
附录	160
钱基博先生学行小传	160
刘梦溪先生关于开题报告的函	186
刘梦溪先生关于博士学位论文的评语	188
参考文献	190
后记	202



第一章 绪论

在中国文学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清末民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随着中西文化思想交汇和社会剧烈变革而来的，是传统文化被迫进行整体转型，以及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的逐步建立。其中，“国家文学史”这一研究新范式的引入，特别是“当代人讲述当代文学史”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

第一节 清末民初时期对“旧文化”的检讨

与春秋战国、明末清初相比，清末民初时期的社会转型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思想观念更新速度快，对“旧文化”的检讨很激进，传统文化流失非常严重。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思想大多出于王宫，属于“官学”。“周朝前期，官与师不分。……只有‘官学’，没有‘私学’。……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的知识。这



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①刘向就曾系统地追溯过各家的起源，其子刘歆还把百家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类，并点明了各家的作用，如“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长也”（见班固《汉书·艺文志》）。百家的形成，意味着接受传统文化的人员范围的空前扩张；在争鸣过程中，各学术流派思想都得到了发展，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得到了弘扬。

“和大众的意识相冰炭的思想系统是断难久据要津的”^②。儒家凭借与传统信仰的深厚联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巩固大帝国的统治权所必需的统一思想，长期处于独尊位置，并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被不断地加以意识形态化和日常生活化：“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③

然而到了明末，情况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伴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文化繁荣，具有主体精神的民本思想在传统文

①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② 张荫麟著：《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③ 陈寅恪著：《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3页。